

学习材料

【第4期】

教务处编

2019年4月10日

目 录

【理论研究】

跨界、整合和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体会（作者：姜大源，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
高职教育扩招：一个社会治理角度配置教育资源的案例解读 （作者：刘继安等，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6

【学习研讨】

陆国栋：学科竞赛是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补充（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12
陈锋做客新华网访谈间：产教融合需要学校和企业强化共同意识、推进共同行动 （来源：新华网）	14
大力推进慕课建、用、学、管 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来源：新华网） ...	16

【理论研究】

跨界、整合和重构：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三大特征

——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体会

作者：姜大源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7期）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而不是一种教育层次的观点，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中，已有过一些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究。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为此，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经过 5~10 年左右时间”，将“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旨在“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这是国家在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计，在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全局性实施方案，具有非常深刻而长远的意义。

《实施方案》的关键词是转型，即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要从普通教育转向类型教育。从一种类型转化为另一种类型，意味着这是一种范式的变化，就是一种创新。而大凡谈及类型，一般是指“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基于此，要界定与职业教育有着共同特征的事物，就需要从系统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厘清与普通教育的基本区别及其主要联系，以确定实现这种范式转变或转型亦即创新的关键要素，对其予以整体性的梳理，进而确立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不可替代性的基本特征，以确保职业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路径前行。

《实施方案》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并将其理性地升华为国家策略，使得党和国家关于“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的指示落到了实处。尤其是《实施方案》开宗明义地指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不同的教育类型，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是有着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普通教育不可替代的教育特征的。逾 8 000 字的《实施方案》，内容充盈、视野开阔、底蕴深邃，贯穿其中的是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特征的一根红线，可将其归纳为三大特征：一是企业与学校跨界合作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二是产业与教育需求整合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三是共性与个性框架重构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

一、企业与学校联姻的跨界合作，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协同育人的办学格局在于由一元主体转向二元主体：从传统的普通教育，即往往只有学校这样一个单一学习地点的办学及运行格局的定界教育，向现代的职业教育，亦即在具有学校与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双元或多元办学及运行格局的教育转变。

从一元结构走向跨界的双元结构的办学格局，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一个特征。

职业教育以学校与企业联姻的跨界合作为其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因此必须有跨界的思考。

普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都是在只有学校这样一个学习地点的参照系下运行的，是一种在教育系统内部结构的框架下实施的教育行为；而职业教育所涉及的全部教育活动，则是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框架下运行的，是一种在教育系统内部结构及其外部结构相互耦合连接的参照系下实施的教育行为。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不仅要注重普通教育所关注的学校、学习和教育这3要素构成的领域，而且还要关注普通教育较少顾及的企业、工作和职业这3要素构成的领域。这表明，职业教育办学的参照系覆盖了与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相互关联的领域，其定义域的范畴两倍于普通教育。

鉴于此，职业教育跨界办学所构建的企业与学校协同育人共同体的结构，使得职业教育不仅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而且还要跳出企业看企业，出现三大跨越：其一，跨越了企业与学校割裂的桎梏，由此必须关注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学校制度的融合；其二，跨越了工作与学习分离的藩篱，由此必须关注工作规律与学习规律的融合；其三，跨越了职业与教育脱节的鸿沟，由此必须关注职业及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及教育认知规律的融合。

显然，职业教育跨界合作的办学格局，使得有资格的企业在职业教育框架下，将成为具有与学校同等地位的一种教育机构，这就大大扩展了教育学关于教育机构的解读。与此同时，还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和培训。概括来说，《实施方案》至少涉及职业教育合作办学的十大举措：①建立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的职业院校设置标准和覆盖大部分行业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②推动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举办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万计产教融合型企业；③分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④建设大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推进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建立国家技术技能大师库和大师工作室；⑤遴选、培育和规划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⑥建设大批校企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⑦办好技能大赛、职教活动周、世界青年技能日和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进校园活动；⑧鼓励中职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⑨落实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

职责，推动职业院校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⑩组建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

二、产业与教育链接的需求整合，是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在于由单一需求转向双重需求：从传统的普通教育，即往往只在游离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外、与职业实践脱节、仅关注个性需求的纯学校形式的育人教育，向现代的职业教育，亦即将创造物质财富的产业需求与培育人文精神的教育需求整合为一体的教育转变。

从单一需求走向整合的双重需求的社会价值，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二个特征。

职业教育以产业与教育链接的整合需求为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因此必须有整合的思考。

普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在学校里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心理活动及基于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的适应与建构的教学来获取知识的，与学校外部的经济和社会无直接关联，基本上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而职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则与学校外部的经济社会紧密相关，是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教育。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不仅要遵循产业链与教育链、创新链与人才链之间相互衔接的规律，而且还要遵循职业就业需求和教育供给，与个体生涯需求和教育认知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这表明，职业教育必须整合经济发展需求与个性发展需求。

鉴于此，职业教育要整合社会需求与人本需求这两大需求，其纽带是职业，由此必须对职业的重要性予以重新认识。实际上，对人的生涯发展来说，职业比学历更为重要，因为职业具备三大功能：其一，职业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正是职业这个载体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其二，职业是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正是职业这个媒介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职业人；其三，职业是个体张扬天赋的平台，正是职业这个平台使人从自然人成为自在人。

显然，职业教育整合需求的社会价值，使得企业基于经济发展的“功利性”目标与学校基于个性发展的“公益性”目标能够做到有机集成和互补，这就大大扩展了教育学关于教育范畴和教学内容选择的基准与范围。与此同时，还要关注社会各类人群接受职业教育以及就业和创业的需求。概括来说，《实施方案》至少涉及职业教育需求整合功能的十大政策：①建立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统一招生平台，保持高中阶段普职比大体相当；②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③将符合条件的技师学院纳入高等学校序列；④发展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⑤依据职业标准联合行业制定国家教学标准；⑥实施产教融合工程，建设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⑦推

进国家学分银行和学习成果可追溯、可查询、可转换的个人学习账号建设，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相互认定和转换；⑧实施技能大赛选手免试入学政策；⑨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及残疾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⑩建立职业教育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开放的机制并设立退役军人教育培训集团（联盟）。

三、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是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制度创新的逻辑工具在于由单维思维转向多维思维：从传统的普通教育只关注认知的单维度，即学科知识积累、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向现代的职业教育关注认知与行动兼容的多维度，即知识、技能或资格等行动知识的积累与职业能力的提升并重、升级涵盖升学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教育转变。

从单维思维走向辩证的多维思维的逻辑工具，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三个特征。

职业教育以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为其制度创新的逻辑工具，因此必须有重构的思考。

普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主要在个体就业前或谋职前进行，是基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学习，以受教育程度的层次提升为目标，显现为“一条路走到黑”的教育路径。职业教育所涉及的教育活动，则需要在综合考虑诸多教育要素的情况下，要针对普通教育蕴含的共性规律与职业教育独特的个性规律之间的博弈予以辨析创新。这意味着，要辨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实现从共性的教育制度向个性的职业教育制度的重构，从基于存储的仓库式课程结构走向基于应用的工作过程课程结构的重构。这表明，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走向“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不二论”思维，实现博弈双方矛盾的辩证统一。

鉴于此，职业教育既要借鉴共性的普通教育的制度设计，更要进行辩证的兼容并蓄的制度创新，要对公平、价值和内容三大教育焦点有清醒的认识：其一，从封闭向开放，要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实现横向多类型、纵向多机会的教育；其二，以类型定层次，要健全普职等值而非同类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实现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其三，由存储到应用，进行职业需求导向的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和教学实施，实现从知识存储转向知识应用的教育。

显然，职业教育框架重构的制度创新，使得职业教育在应对各类困境和质疑时，要善于运用经验归纳与趋势预测、正向推理与逆向反思、静态构成与动态生成等辩证分析的方法，这就大大丰富了教育学和教育哲学的内容。与此同时，要依据新时代的要求对原有制度予以重构，采用辩证逻辑的工具进行制度创新。概括来说，《实施方案》至少涉及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十大制度：①“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简称1+X证书）制度；②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③“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

④职业教育“双师型”师资聘用、试用制度；⑤企业和学校工作人员相互兼职兼薪的制度；⑥民办职业教育的准入、审批、退出制度；⑦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度；⑧职业教育奖学金制度；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和督导评估制度；⑩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近两年来，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实施方案》与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关于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一脉相承。如果说，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指示，是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性纲领的话，那么，2017年12月5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则是路径性指引，2018年2月5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更是操作性措施。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调整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及李克强总理关于“要大力办好职业院校，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指示，就更进一步指明了要解决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而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增加对学前教育、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职业教育等投入的决议，又为职业教育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这表明，《实施方案》已成为落实上述系列决策的具体实施方案，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给予了更加清晰的定位，必将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拓展一片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高职教育扩招：一个社会治理角度配置教育资源的案例解读

作者：刘继安、陈志文、李马英夏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

【摘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今年将扩招100万人，成为两会关于教育的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中央政府此举旨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根据政策设计，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将与普通高中毕业生一道，成为扩招的生源。从高职大扩招作为社会治理的政策工具的视角，对该项政策的实施进行可行性分析，探讨此举对我国高职教育乃至整个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体系的整合与发展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高职教育；扩招；就业；社会治理；政策工具

高职扩招100万，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表述并不是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教育工作板块，而是在“双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部分。显然，高职教育扩招100万，不是从教育角度，而是从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角度出发的，即从国家社

会治理角度出发的。把教育扩招作为社会治理的政策工具，并非首次。1999 年的高校大扩招，遵循的是同样的治理思路。

一、两次大扩招作为社会治理政策工具的动因

1998 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在时任亚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国务院参事汤敏等人的建议下，中央政府将高等教育扩招作为拉动内需和延缓就业压力的政策工具，直接要求当年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 50 万，并召开会议将扩招任务层层下达，就此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阶段。1990 年，全国高校招生不到 61 万人，1998 年招生 108 万人，8 年时间增长 47 万人。而在 1999 年，招生总量跃升至 160 万人，一年增长 52 万人。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跨过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2018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48%，直逼高等教育普及化基线。

其实当年，在汤敏等人上书中央呼吁扩招之前，社会上就存在我国高等教育需要配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从精英教育转入大众化发展的争论。当时，反对扩招的声音主要集中在教育内部，源自对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和质量下降的关注。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高校扩招被政府当作应对经济社会挑战的政策工具。1999 年的大扩招，至今仍然有许多不同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大扩招为我国在过去 20 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了人才储备，功不可没。

20 年后，我国再次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发展局面，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2018 年国内 GDP 增速仅有 6.6%，是近二十年来的最低值。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央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把 2019 年度 GDP 增长目标仅设定为 6%~6.5%。而稳定和扩大就业，是追求增长质量背景下，必须解决的大问题。高职扩招 100 万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解决新增劳动力的目标是 1 100 万。在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下，我国经济正在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即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引发较大范围下岗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在 2018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答记者问时提到，在一些企业中出现技工短缺、熟练劳工短缺、新型人才短缺的现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在 2019 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时表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

合力推动之下，将高职教育大扩招作为稳定和扩大就业、应对产业升级所需劳动力结构调整的政策工具，也就不难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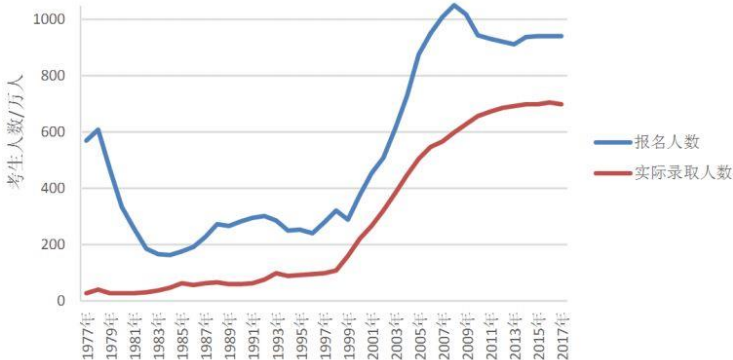
二、高职教育大扩招作为社会治理政策工具的可行性分析

1. 传统生源根本无力支撑高职大扩招。对于 100 万的扩招目标，第一个问题就是生

源从哪里来？熟悉高职教育的人都了解，近年来高职教育生源不足问题已经显现。据统计，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 790.99 万人，其中高职高专招生 368.83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8.1%。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202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 40%，但这一目标在 2015 年就提前完成了。于是国家修订了这一目标，提出到 2020 年达到 50%。目前，这一目标会因此次大扩招而大幅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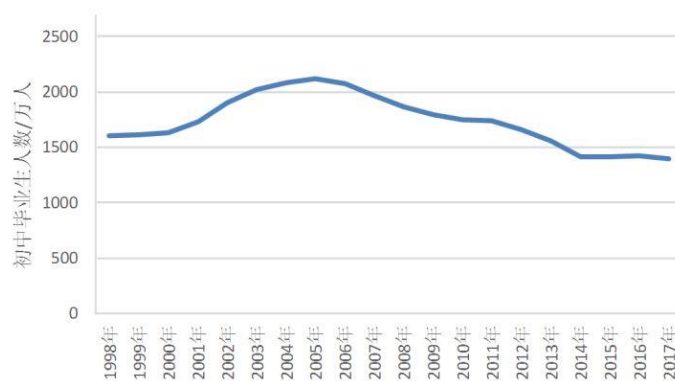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招生人数的快速增长，而是因为适龄人口的快速下降形成的。2018 年，根据各地考试院公布的信息，全国近一半省、市高考实际录取比例已经超过 90%。很多地方，高职院校招生困难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对全国抽样的 40 多所高职院校统计数据显示，录取平均不报到率超过 15%，报到率低于 70%的高职院校不在少数。在这种背景下，再扩招 100 万，生源从何而来？

根据教育部与相关部门的统计，因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近年来高中毕业生一直在低位徘徊。2008 年高考报名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的 1 060 万人，此后连跌 5 年，2013 年跌至历史最低的 913 万。近年来，高考报名人数开始企稳，甚至陆续回升至 940 万至 975 万。（见图 1）高考人数显著增加，主要是因为教育部门打通了中职学生升高职的路径，致使高考生源中单招以及关联的春季招生的中职考生数量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由于适龄人口下降，初中毕业生人数呈下行趋势。（见图 2）从长远看，传统生源根本无法满足高职扩招需求。



数据来源：教育部官网数据及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 1 1977—2017 年高考报名人数和实际录取人数趋势图



数据来源: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图2 1998—2017年初中毕业生人数趋势图

2. 非传统生源是此次扩招的重要目标生源。鉴于高职教育大扩招政策工具的“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目标指向,转业军人、农民工、下岗职工等群体是预期的生源群体。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在GDP为6%的背景下,再培训、提高职业技能被当作是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就业问题的手段。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快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扩招生源来源有清晰的表述: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这些群体也正是我国目前就业主要矛盾所在。

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安置困难曾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8年4月16日,在政府机构精简的背景下,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成立,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是该部门的一项重要内容。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该部门2018年落实了8万多名军转干部、40多万名退役士兵、2400名复员干部、9000多名军休干部和退休士官接收安置任务。对退役军人进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再就业能力,有利于妥善解决退役军人安置问题。2019年退役军人事务部9项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教育培训,加大就业创业的服务扶持力度,提高退役军人的就业竞争力”。

下岗职工。供给侧结构调整,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导致一部分传统产业的职工下岗。据《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7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201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近五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无疑,参与能够获得当前新兴产业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提升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的有效手段。

农民工。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在持续上升,然而,“招工难”的现象依然非常突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需求大量技能型人才,而非缺乏技能的农民工。据《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农民工总量将达到 2.8 亿，但东部地区农民工增速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甚至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数比上年减少了 45 万人，下降 0.9%。这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职业技能要求提升有很大关系。最近几年，珠三角出现了持续的结构性“招工荒”，就是高技能型人才稀缺的佐证。

一方面是这三类人就业不充分，另一方面却是高技能人才的匮乏，即劳动力结构性供需失衡。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据《2018 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市场对具有技术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劳动者的用人需求均大于供给。据统计，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市场对高级技能人才和技师的需求增幅分别为 18.5% 和 6.8%。一边是不断增长的需求，另一边是我国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供给不足。由此可见，把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送进高职院校培训后再就业，不仅可以有效缓解眼前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有效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需矛盾的有效办法。

但是，要吸引这三类人到高职院校求学，显然需要更多财力支撑。因为与应届高中毕业生主要依靠家庭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用不同，他们的教育支付将更依赖自己的收入和国家财政的支持。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扩大高职院校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报告也明确提出，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 000 亿元，用于 1 500 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显然，国家已经准备了一笔经费用于高职教育发展。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中也明确规定，“退役士兵退役 1 年内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费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1 年以上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也就是说，与规制性政策工具相配套，诱导性政策工具也在同时使用，通过向个人或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鼓励目标群体采取行动。现在的关键是，高职院校能否把这些人有效地吸纳进学校。

3. 大扩招将倒逼高职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转型。陡然增加 100 万意味着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近 1/3 的高职招生量，高职院校是否有这么高的承载能力？二十年前的高等教育大扩招，全国大多数高校都曾经经历过一个痛苦的扩张过程，仓促之下，因为师资、教学资源以及后勤服务资源短缺而导致短期质量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高职院校此番也必然遭遇这种瓶颈，师资、教室、实验实习场所、食堂、住宿等硬件也必然捉襟见肘。在近年的相关评估中，高职院校软硬件不达标率接近一半，一些高职院校仍然苦苦挣扎在基本办学条件的合格线上。在已经捉襟见肘的背景下，扩招 100 万带来的巨大压力，必然影响到高

职院校的办学定位与办学思路。

高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培养一线高技能型人才，理应与劳动力市场有着最直接最紧密的联系。然而目前高职教育教学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及企业岗位的需求。首先，高职院校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观念根深蒂固，没有针对高职院校专业特色和生源特点以及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其次，由于课程内容并非根据职业岗位能力来设定，大量课程内容与岗位能力需求不相符合。很多高职课程对于实验、实训等课时安排的比例偏低。此外，高职教师生产实践经验缺失，实践教学能力差，很难培养出适应企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职业人才。

生源结构的巨大变化，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全面进入高职院校，除了学业基础参差不齐外，这三类人绝大多数难以脱产学习，且对于高职院校的办学内容与质量将提出更实际的要求，要的是能养家糊口的技能。此举将倒逼高职院校在发展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发生颠覆性变化，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转型。

三、高职教育大扩招是教育供给结构系统性变革的前奏

显然，国家相关部门并没有把高职教育当成传统意义上的普通高等教育系列加以考虑，目前的计划更有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意蕴，高职教育的定位势必要发生变化，从作为学历教育的一个类型，转变为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等级和培训并重。

我国高职教育当前的转型，与美国社区学院的发展历程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社区学院的前身是诞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初级学院，诞生于美国从农业国家快速向工业国家转变，需要大量有熟练技术的产业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时期。因其学费低廉、方便就学、提供实用技能培训而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由初级学院到社区学院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以法案形式实施的政策工具发挥了极大作用。1944 年美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向退伍军人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到美国各类院校学习。社区学院因其入学门槛低、学费低、提供实用技能培训而备受退伍军人青睐。之后的《区域再开发法案》（1961 年）、《职业教育法》（1963 年）、《民权法案》（1964 年）等，使得社区学院进一步发展。这些法案的共同点就是旨在推进地区“高中后”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保证上述政策的顺利实施，联邦政府进行大力度的经费支持，如按照《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下拨给各州的专项经费中 1/5 要投入到社区学院的运作，从而加速了社区学院的发展。在受教育人数猛增的同时，社区学院的功能也进一步多样化，提供包括转学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区域文化中心等职能。

美国社区学院从培养层次来看，专注于技能型人才培养；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是解决

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紧密对接。

参照美国社区学院经验推论，此次高职教育大扩招，有可能成为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未来高职教育的定位可能将与继续教育和国家层面的职业培训再次整合。

四、结语

从教育视角来看，此次高职教育扩招带来的挑战与难题会非常多，一些问题几乎无解，因而社会上存在着与当年反对 1999 年高校大扩招相似的反对声音，也就不足为怪。但从宏观经济社会背景、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看，结论可能会不一样。二十年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扩招，推动力量主要是中央政府，核心目的是解决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与就业压力，最大的反对声来自教育系统内部对高等教育容量和质量的担心。二十年后再回顾那场大扩招，支持的声音多了，大多数人认为总体上利大于弊。

此番高职教育大扩招，同样也是外部推动。中央政府再一次使用规制性和诱导性政策组合工具，试图通过高中后教育供给的系统性变革，解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就业与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等棘手问题。在加强诱导性政策工具力度、提升高职教育体系的组织学习能力和进行系统性变革方面，将成为后续政策的关注焦点。

【学习研讨】

陆国栋：学科竞赛是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补充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2019 年 2 月 27 日）

日前，“2014-2018 年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排行榜”在杭州发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浙江省余姚市副市长陆国栋教授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竞赛评估与管理体系研究》专家工作组介绍了排行榜概况。

他指出，本轮学科竞赛排行榜秉承了引导高校和优化竞赛的思路，遵循着公平、公开、公正，引导性，可操作性，分类和成果导向的五大原则，对 34 项高校学科竞赛进行了评估，共计发布 12 个榜单。中国教育在线就本轮学科竞赛排行榜中的几个要点采访了陆国栋教授。

一、中国第一个面向高校人才培养的排行榜，着眼创新能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排行榜》是中国第一个面向高校人才培养的排行榜。陆国栋教授认为，竞赛一定是有功利性的，恰恰需要对这种功利性进行适当引导，这也是进行竞赛评估的动力之一，但不能唯功利，最终还是要站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角度上来考虑问题。

他认为，目前高校往往专注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推动起来比较困难，但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长”出来的，而不是教出来的，人才培养成效具有滞后性，需要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他提出，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从根本上来说，要打破唯分数论的观念，没有分数和绩点是万万不能的，但分数和绩点一定不是万能的。

他说，由于学科竞赛更强调实践，强调逆向思维、发散思维以及能力的培养，因此是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有效补充。

二、1126 所本科高校进入本轮学科竞赛排行榜，覆盖率超 90%

综合来看，有 1126 所本科高校进入到了本轮学科竞赛评估排行榜中，覆盖了全国 90%以上的本科高校。据陆国栋教授介绍，从各类型高校整体进榜率来看，综合类高校为 93.54%，理工类高校为 92.91%，人文社科类高校为 84.52%，农林医药类高校为 82.82%，师范类高校为 96.39%。各类型高校的入榜率均超过了 80%，这意味着学科竞赛的覆盖率已经非常广了。他表示，本轮评估中的本科高校入榜率是在意料之中的。

通过对分类榜单的分析，陆国栋教授认为，一方面可以看出不同学科优势高校的分布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学科竞赛的发展也还不平衡，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总体来说，理工类竞赛的组织历史比较长，较为规范，数量较多，参与的高校也比较多；而人文社科类竞赛的数量还比较少。他建议，不同的学科门类未来应该更多地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来进行竞赛模式设计，例如创意类竞赛可能更适合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竞赛评估也会通过“组织贡献”等方面的考量来进行引导。

三、高职院校入榜率低于预期，要更好地组织高职类学科竞赛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在本轮学科竞赛评估中，纳入 4 个针对高职院校的竞赛项目，发布了 2 个高职类排行榜。高职类排行榜中所涵盖的竞赛项目主要包含了三大类，一是针对高职院校的竞赛项目，二是高职学生参与本科类竞赛项目，三是面向高职的世界技能类大赛。

据陆国栋教授介绍，本轮学科竞赛评估中，高职院校的入榜率低于预期，为 66.64%，只比上一年度增长一个多百分点。他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高职类竞赛目前主要以教育部推进为主，应该适度的进行多样发展；另一方面是受不同省份及地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浙江、江苏、广东、北京的高职院校在本轮竞赛评估中相对比较领先。

他认为，接下来，对于没有获得奖项的高职院校来说，挑战会更大，要更好地组织并参与学科竞赛。

(网址: 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1902/t20190227_1646478.shtml)

陈锋做客新华网访谈间：

产教融合需要学校和企业强化共同意识、推进共同行动

来源：新华网（2019年4月4日）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

日前，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做客新华网访谈间，围绕《实施办法》相关要求，回答了企业如何通过“投资于人”积累人力资本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等相关问题。

推进产教融合改革需要企业积极参与

陈锋介绍表示：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

2016年，党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对产教融合改革作了顶层制度设计。

“近年来，国家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不断出台鼓励和支持产教融合的相关政策，也鼓励企业积极、深入参与产教融合。”陈锋表示，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改革、培育市场创新主体三个方面都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改革的过程，需要企业积极参与，如果没有企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就会落空。”

陈锋认为：

从培育市场创新主体来讲，产教融合一方面有助于解决企业创新发展中的人才和科技瓶颈，增强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对推动创新创业培育创新创业新主体方面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今天，人力资本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推动双创深入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对企业来讲，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必须注重投资于人，必须把人力资本的挖掘、培育和激励放在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位置。”

通过产教融合 在我国形成创新生态系统

近年来，高职院校和地方本科高校先后启动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核心的转型发展，校企结合和产教融合取得很大进展。但仅仅依靠学校的主动是不够的，陈锋认为，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是非常重要的主体，无论是从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出发，还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出发，企业对产教融合有内在需求，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工场”，产教融合型企业应当朝着建设新型学习工场的目标迈进。他期待在“新型学习工场”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很好地帮助学校实现学科专业体系、学习场景的变革，推动学校课程变革和学校学习方式的变革。

“产教融合不仅仅是学校和企业在一些具体课程和项目上的合作，我们希望通过产教融合能够打造一个新型的创新链、产业链、教育链和人才链。”陈锋表示：“我们希望把产业链和创新链重新进行调整，把人才链和教育链重新进行调整，使它们融合到创新生态系统中间。不管是中小企业还是研究型大学、应用型高校、职业院校，都可以在这个中间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这样的产教融合，能在我们国家形成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从而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动力。”

学校和企业都需要建立四个共同的认识

陈锋提出，对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来讲要持续深化“机制性改革”，他认为，重点要突出三方面：第一，需求导向。“从过去以供给导向为主转向需求导向为主”。第二，坚持创新导向。“推动产教融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创新生态系统，要坚持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作出学校的贡献。”第三，坚持贡献导向。“如何评价学校的人才培养及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贡献，最重要的是看为国家战略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为社会和民生建设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与此同时，陈锋认为，伴随着《实施办法》的出台，学校和企业都需要建立四个共同的认识：

首先，通过产教融合，共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其次，通过产教融合，要共同应对新技术的革命。

第三，要共同建设技术技能积累创新的共同体。

第四，共同传承和弘扬创新精神、工匠精神。 “

产教融合不是把企业等同于学校，也不是把学校等同于企业，而是企业和学校要各自发挥各自特长，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二者在创新过程中起到的是相辅相成、叠加倍增的作用。”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以服务教育改革创新为使命

陈锋表示，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承担好职责：

第一，加强政策宣传。

第二，做好智慧平台，加强产教融合的研究，为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进一步推动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与产教融合相关的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在实践方面进行大胆创新。第四，大力推动产教融合国际合作。

（网址：http://education.news.cn/2019-04/04/c_1210099507.htm）

大力推进慕课建、用、学、管 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

来源：新华网（2019年4月9日）

新华网北京4月9日电（陈梦瑶）9日，在中国慕课大会上，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钟登华为第二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结果和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代表颁发证书，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到中国慕课建设应用中来。会上，钟登华发表了题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国慕课》的讲话。

讲话指出，中国慕课建设自2013年起步，经过6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大带小、强带弱、同心同向、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12000余门慕课上线，2亿人次学习，6500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全社会广泛受益，开辟了一条满足全民多样化需求的信息化学习道路，为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应时代主题，高等教育要掀起一场课堂革命。钟登华指出，当前，我们要用好慕课这关键一招，突出以学习者为中心，推进教学组织形式、学习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创新，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促进学习者主动学习、释放潜能、全面发展。

讲话强调，要把慕课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作为加快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一招，总结经验、凝聚力量、改革创新，大力推进慕课的建、用、学、管，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轨超车。

一要打好“建”这个基础。要围绕育人建。建慕课的根本目的是人才培养，要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育人和育才相统一。要立足专业建。慕课是提高专业教学水平的重要抓

手，要主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建设一批“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课程，引领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提升专业建设质量。要依靠教师建。建设高水平慕课，关键在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突出质量和特色，动员名校名师建慕课，把学术研究最新成果及时融入教学内容，将学科优势转化为课程优势，提高课程创新性和挑战度。

二要聚焦“用”这个关键。要创新方法用。高校要大力推进基于慕课的教学改革，引导广大教师会用慕课、善用慕课，用慕课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水平，增强教学效果。要联合共同用。要积极探索政府、高校和平台协同机制，打造慕课应用共同体，创新基于共同教学需求的慕课推广模式，推动校际间、教师间、师生间和生生间的联合应用。要注重实效用。要积极开展线上与线下、课堂与实践等混合式教学，既见课又见人。

三要围绕“学”这个目的。要推进学生学。要推进教学管理制度创新，因校制宜制定慕课引进和应用机制，建立健全学分认定、转化制度，满足学生慕课学习需求。要服务全民学。大学不仅要重视建设专业性强的慕课，还要重视建设受社会欢迎的科普类、知识类、服务类课程，为全民终身学习贡献大学力量。要拓展国际学。要积极引进适应我国需求的国外优质慕课资源，尤其是要重点引进反映学科新进展、技术新进步的慕课，充实到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拓展学习者视野。

四要做好“管”这个保障。要管质量。高校要加强质量管理，建立慕课建设、质量审查、课程运行和效果测评等制度。教育部将实施一流课程双万计划，研究制订政策和标准，推动优质慕课建设。要管服务。要为学习者提供测验、作业、考试、答疑、讨论等全流程教学服务，及时开展在线指导与测评。要管安全。要依法依规加强慕课和平台管理，建立健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运行服务安全的规章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慕课和课程平台的资质管理，促进慕课可持续发展。

钟登华指出，准确把握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时机，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腾而至，作为人才摇篮、科技重镇、人文高地的中国大学必须超前识变。提高质量、推进公平是 21 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进入“互联网+教育”新时代的中国大学必须积极应变。网络改变教育、智能创新教育，网络 and 智能迭加催生高等教育“变轨超车”，担负着中国创新发展引领作用的中国大学必须主动求变。

（网址：http://www.hie.edu.cn/news_12577/20190410/t20190410_994085.shtml）